

哲学 与贵阳发展

论文选

高艳 主编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与贵阳发展论文选/高艳主编. —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3. 1

ISBN 7 - 80650 - 339 - 0

I . 哲… II . 高… III . 哲学 - 文集 IV . B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0099 号

哲学与贵阳发展论文选

高 艳 主编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字数 8.625 印张 215 千字

印 数 1 - 1 000 册

版次印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0650 - 339 - 0/B·4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白云大道 156 号 电话:4843909 邮编:550008

《哲学与贵阳发展论文选》编委会名单

顾 问：

孙国强 辛维光 秦家伦

编 委：

高 艳 李 黔 李世同 王晓昕

江先仪 罗明空 郭长智 刘国华

姜金锡 周贵发 黄筑红 白陈新

主 编：高 艳

副主编：李 黔 姜金锡

编 审：姜金锡

编 务：姜金锡 刘国华 白陈新 黄筑红

周贵发

前 言

为了进一步激发贵阳市哲学学会会员的研究热情,繁荣我市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市哲学学会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我们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的要求,编撰了这本《哲学与贵阳发展论文选》,作为本学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份献礼。

本文集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哲理性较强;二是哲理与实际的结合。多数文章是我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哲理的学习与研究。我们相信这部论文集的出版会有益我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彼此的交流、沟通和借鉴。

论文集选用的文章作者,均是贵阳市哲学学会会员。我们尊重原作,文责自负,基本是原文照录,保持原貌。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如数字的书写改为阿拉伯数字,序号统一。为使体例一致,文章原有的摘要和主题词、关键词一律舍弃未用。

在编辑出书过程中,我们得到学会顾问中共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国强、市委副书记辛维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秦家伦和学会会员及有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对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本论文集中疏误不当之处,敬请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编委会

.....

目 录

哲学与发展.....	王晓昕(1)
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高 艳(11)
对新时期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思考	李 黔(17)
在西部大开发中加快贵阳教育发展的思考	罗明空(25)
论网络道德的三原则	刘国华(42)
走不出现代困境的新儒学	陶渝苏(49)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独特表象	周贵发(56)
用素质教育理论述评孔子内省而外敛的教育哲学思想	阮朝辉(65)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和 新时期的发展	张书云(73)
网络信息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整合	杜勇敏(86)
“以德治国”的哲学思考	郭长智(92)
信用缺失的法哲学思考	曹乐平(99)
一般、个别与“特色”问题的思考	唐忠伟(110)

关于贵阳市诚信道德建设的思考	何志玉(115)
新世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	左才慧(119)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反对邪教“法轮功”	钟庆华(124)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刘真理(129)
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与开拓创新	杨云鹏(137)
人的本质与教育	刘 晴(150)
论西部开发中观念意识的构建	朱 丹(156)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	赵开舟(162)
“金阳精神”提炼与表达的几点建议	白陈新(168)
再谈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贺祝群(173)
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体现	陈月平(181)
试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涂兴华(191)
邓小平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哲学观	邓永昌(197)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刘一林(208)
唯物史观是“三个代表”的理论基础	陈昌志(219)
加强作风建设的几个哲学问题	王 学(226)
“法轮大法”批判	
——析“法轮大法”基本观点和基本骗术	施德谦(235)
科学与人文:人类洞悉世界的两种方式	庄 通(244)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争论及其现代意义	龙宣萍(254)
孔子辩论法思想浅析	姜金锡(261)

哲学与发展

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晓昕

这是一个永恒而又常新的命题。

这个命题中所包含的两个概念“哲学”与“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哲学的研究对象上看，哲学研究世界的本质与普遍规律。规律是发展的，这自不待言；本质也不是静观的对象，而是运动变化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世界的普遍发展。

其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这个总特征是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领域的运动变化规律的高度抽象与概括。

其三，哲学自身是发展的。发展的哲学与哲学的发展，这是一个始终缠绕着古今中外哲学家，并诱使他们为之毕生攀援但终不能达到最高顶点的永恒而常新的课题。

如果将“哲学与发展”作进一步的引申，即将其作为方法论去指导实践，这个概念就会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展现其特有的魅力。哲学与世界的发展、哲学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哲学与教育科技的发展、哲学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一个个有关“哲学与发展”的问题，就会从它原先那个抽象的出发点，降临到我们人类所面临的最为现

实的问题的层面上。

一 哲学的发展理念

哲学进步与发展的一个最令人注目的情况,就是哲学把自己的目光从外部世界收回来,向内深入地认识人自身。

古代希腊人以研究自然哲学闻名于世。他们的兴趣之一就是寻找世界的本原,寻找万物统一的基础。他们的眼光直接投向一些具体的存在物,用一些具体存在物来表示普遍,如水、火、土、气、原子等等。他们的自然哲学没有脱离感觉,思辨形而上学在他们那里还只是萌芽,因此他们没有设想一个超验的世界,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不过他们的自然哲学研究却启发了近代自然科学。

哲学的第一次醒目的进步,是哲学家们把眼光从直接存在物转向普遍,从具体转向抽象。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设想了一个超验的圆满的理念世界,它是世界上现实事物的根源、本质。现实的事物不过是理念的摹本。理念是完美的,现实事物总是有缺陷。因此,柏拉图试图去追求一种永恒的圆满的知识对象,从而虚构了一个和感觉世界没有联系的形而上学的世界。

希腊神庙中有一句箴言:人啊,认识你自己吧!智者们也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类的命题。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能维持得很久。希腊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在罗马帝国末期遭到了一股强大的宗教势力的阻碍,并最终被扼杀。在封建的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是惟一的文化,经院哲学是惟一的哲学。哲学为宗教服务,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因此哲学所重视的问题,研究的兴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院哲学所关注的对象不是自然界,不是人,也不是人的思维,而是超验世界,是上帝、天使和圣人。人认识了上帝也就认识了人自身,人惟有认识上帝才生活得有意义。人什么也不是,

上帝才是一切。中世纪代替古代世界的结果就是上帝代替了人。所以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显得何等地重要,它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哲学发展史的里程碑。人文主义哲学致力于摆脱教会的束缚,摆脱封建教会的羁绊,从争取行动上的自由扩展为争取思想上的自由。人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

经济上的繁荣和思想上的解放的一个有意义的结果就是思想开始重新关注现实,研究兴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然科学从神学中摆脱出来。理性代替信仰成为人类生活的权威。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研究自然界本身,从天上转到人间。哲学从研究自然到研究人,从研究人的感性存在到研究人的理性存在,的确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但中国哲学家却在一开始就接触到对人本身的深入研究。孔子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创立哲学体系的思想家,他的哲学第一次把人的问题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天人”之辩是先秦时候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孔子虽主张传统的天命论,却又着重考查了人道。他的哲学的核心概念“仁”以人为载体和对象。例如《论语》说道: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雍也》有曰: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颜渊》有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说的“仁之方”,就是用推己及人的方式来实行仁。而要“推己及人”,实际上是以两个原则为前提:一是人道(仁爱)原则,即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是理性原则,即肯定人同此心,每个人的理性都能判断是非、

善恶,所以“能近取譬”。

孔子以为,在天下万物中,人是最重要的。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同鬼神相比较,首先应关心人。有一次,马厩失火被焚毁,孔子退朝归来,“曰:‘伤人乎?’不问马。”同牛马相比较,也应首先关心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人要和人相处,过社会生活,那就必须互相尊重,互相同情,互相信任。

孟子从人性的角度来考查人,提出了“人本性善”的人学理论。但是孔子也好孟子也罢,他们关于人的理论都是包含了等级差别的。而明代王阳明关于人的理论则有标异立新之见。下面我们从王阳明倡导“狂者”学风和主张“人要随才成就”两方面,来考查其关于人的理论。

王阳明对人的行为与生命的关怀,体现在他对学生表现出一种主张“狂者进取”的态度。作为一个教育家,阳明居官时一直讲学,兴建书院,举办社学。在他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有极为鲜明生动的事例成为他独具风范的佐证:《年谱》记载,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王守仁在越,正月,“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八月,宴门人于天泉桥: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诗题《月夜》,有句云:“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休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见《全书》卷三十四、卷二十)

王阳明鼓励和倡导他的学生成为“铿然鼓瑟”的曾点,因而形成了一种比较生动活泼、教条气息比较少的学风,这对于自由人格的培养极有好处。一般说来,中国儒家的传统教育注重理想人格的培养,强调的是自觉原则;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唯意志论哲学的影响,尤其注重自由人格的塑造,强调的是

自愿原则。其实二者各有优长又各执一端。把理想人格与自由人格的培养统一起来,是王阳明哲学对传统儒学的又一改造。

主张“人要随才成就”,是王阳明关于人的理论的又一学说。

王阳明多次以种树为喻来说明人的培养教育过程。他说: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便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学者一会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无助无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传习录上》)

用此种树之喻来说明人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三位一体的。既有德性的养成,又说明人的认识的提高,以及人的志向的确立。在王阳明看来,三者其实是同一心体的发育过程。他的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至今于人仍有重要的启示。

二 哲学与发展的问題

“近些年来,哲学的敏感神经捕捉到生存和发展的问題,表明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成为很实际的问題。”(《生存与发展:一个时代性课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12期)生存与发展、生存与死亡,这是辩证法,是一切事物和现象都要面对的辩证法。

个人、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问題。这些问題表现为种种矛盾和危机、机遇和挑战。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題。”和平和发展本是不可分开的。没有和平,发展就没有可能;没有发展,和平就没有支撑。但是,和平与发展都是以生存为前提的。首先得有生存,才谈得上发展。现在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題,已经不仅仅是发展问題,更是生

存的问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題。这样的问题很多:环境、生态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贫困问题,战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使人类生存的确面临了很大的问题。且不说发展。也就是说,当人们把发展当作惟一目标时,发展就被异化了,生存的危机成了发展的异化物。原以为是先有生存,后有发展。现在是发展导致了生存危机这样的直接后果。人们把生存作为发展的基础,把发展作为生存的目标,以发展求生存,在发展中改变生存方式,实现生存价值,使生存意义在发展中得以表现和实现,得到彰显和升华,也使作为人的生命本质规定的生存与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内在的统一。

可见科学地理解生存与发展互为依存关系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究其认识上的原因,皆是由传统的发展观所致。人类有史以来即存在着生存与发展的问題。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什么是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发展的认识是不同的。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总是把发展片面理解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这种片面认识至今仍在许多地方的主要领导同志的头脑中起着有形无形的导向作用。我们把这种发展观称之为“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它存在着许多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忽视环境、资源、生态等自然系统对工业发展的承载力。这种观点把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看作是取之不尽的原料库,把人类仅有的栖息地地球视为永远填不满的垃圾场,把我们世代生息的客观条件视为随心所欲的改造物。这种观点实际上说明人们对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还很低下。

第二,“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忽视了自然的成本。这种发展观倾向于单向地显示人类征服自然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没有考

·····

虑经济增长所付出的资源环境成本。这样的经济核算体系容易带给人们“资源无价、环境无限、消费无虑”的错误思想。而在行为上则采取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这样虽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却给地球带来不可估量的污损。今天自然环境的过度污损,将来也许花成倍的代价也难以弥补。这种不计自然成本,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增长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第三,“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观”缺乏整体协调观念。这种观念本着对物质财富的无限崇尚和追求,总是把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经济的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量度的诸经济指标上,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年收入、人均电话部数、进出口贸易总额,等等。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直把GNP作为国家经济统计的核心,作为评价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与衡量国民生活水准的象征,似乎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于是,增长和效率成了发展的惟一尺度,至于人文文化、科技教育、环境保护、社会公正、全球协调等重大社会问题则受到冷落或被淡忘。在这种“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观”的指导下的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异化物,首先是人异化为工具和物质的奴隶,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由于人异化为工具和物质的奴隶所导致的政治体系、用人制度和干部政策,又因此而引发了大量的短期行为、急功近利、无限度地开发、浪费矿物资源、破坏地表结构,等等。

除了审视“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在认识上的失误外,我们看到在哲学上产生的问题已在实践中逐渐被验证。如果说发展是以知性的主客二分作为其框架的,因而基本上是在所谓技术理性维度上展开的直线式进程。它在把人从自然的依赖关系中分离出来之后,又把人的独立性置于对自身的物化及其造物的依赖之上。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一是导致人自身的灵性与物性、目的与手

段的二元分裂和人的物化取向以及手段的目的化,人的德性、情感乃至整个内心世界被严重轻视甚至“荒漠”化;二是如海德格尔所说,人越是张扬知性主体性越会引导出一个强大的客体与之作对。

所以,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发展”概念:一是以主客体二分为前提的属于工具理性的发展概念(“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观”即属此列),一是以人自身为目的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发展概念(“可持续的发展观”)

基于这样一种以人自身为目的的生存论意义的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贵阳提出了建设世界第一个循环经济城市的大胆设想。这种对人的生存方式、发展模式和人生意义的重新理解,与建构面向人类新的生存可能性的生存论哲学相契合,其意义非同寻常。

三 哲学与人的发展

人的问题首先是人的生存问题。在中国、在贵阳,生存问题似乎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生活低保金的发放,使人的生存问题这一矛盾已变得愈来愈趋于平缓。相对而言,人的发展才是一个更为突出的大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人的发展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轻视发展,必然会带来深层次的生存问题。一般人的看法总是认为,先有生存,然后才有发展。其实不然,在生存与发展的相互关系上,有一个如何辩证地思考的问题。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人区别于狭义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恰恰是以发展求生存。人猿揖别,并非歌舞升平的轻松过程。认为人类祖先进化的动因是克服生存危机。这个解决生存危机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发展。猿变成了人,才得以生存。一些不能克服生存危机的物种,就不能发展,就绝种,被开除“球籍”。

不过这里的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題,仅是在最初的层面上被

加以关注。

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哲学问题,理应在多个角度展开为多个问题。

其一,生与死的问题。欧阳康先生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存与发展分别代表着人的生命存在的两极,即生命的底线和上线。——生存是相对于死亡而言的。生存相关,有了人的生命存在,才谈得上人的一切其它问题。”

其二,生存与发展的感性层面。它指的是人的自然生命的存在与物质生活的进步。人的自然生命的存在归结于动物性的存在方式,它是人的事实存在的前提。但人的自然生命存在又不同于动物的直接性和重复性生命存在,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和有意义的生命存在,是在发展中得到展示和实现的生命存在。人的生命的本真意义正在于谋求发展,发展是人类生命存在的高级自觉与永恒追求,也是生命意义的标志。因而考查人的存在又必须从人的自然生命存在进而到人的理性生命存在。

其三,人的理性生命存在与人的生存与发展中的理性需求密切相关。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生命需求共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与保障需要、爱与归宿需要、尊重(自我尊重与他人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真善美、正义、完成、丰富、有意义等)需要、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从人的生理角度考虑,先秦哲学就有关于形气、身心、养气、践行、心知、性情诸说,孔子的“仁学”大力张扬“爱人如己”,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较早地考察了人的爱的需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显然还包含对人的尊重,满足人们尊重的需要的深义。有的人头脑清醒地看待自我实现的满足。不要以为人能做成一些小事,就以为能做成一切大事。忽视客观条件,夸大人的能耐的人类中心主义就产生于

这种夸张的自我阿谀。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仅就人的功利性目的而言,它理应内在地包含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自然的态度。传统儒家学说中关于“天人合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对于现代哲学及其发展理念、人的学说,仍有重要的启示。

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贵阳市委宣传部 高 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而深远,深得民心,顺乎民意。怎样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速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和历史契机,从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的深刻总结中提出的,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理论经受住实践检验,赢得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的一个光辉思想。邓小平的发展观博大精深,它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我国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在实质上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邓小平发展论为指导,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坚持以经济